

冷战后的日本与
中日关系研究丛书

冷战后 美日海权 同盟战略

内涵、特征、影响

高兰◎著

作者简介



高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曾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日本外交思想史、中美日关系、海洋战略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专著4部,在国内及日本等国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曾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日本创价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担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研究专项首席专家(“四种海权发展模式互动中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海洋政策及其中国对策研究”)。

主编简介



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日本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京都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研究会（香港）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已出版专著及主编作品9部，发表中、日、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



更多新书信息及做书趣事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
官方微信订阅号：spph_spph 新浪官方微博：@上海人民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建中路193号 电话：021-53594508
邮箱：spph@sina.com 传真：021-63914796

责任编辑：罗俊 封面设计： 0创意文化
18784489@qq.com



本书出版获得复旦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创新团队
“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新机遇、新挑战”项目资助

编委会名单

主编：胡令远

顾问：郑勵志 林尚立 内藤晴夫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少普 王 勇 李 玉 李 薇 杨伯江 杨栋梁
吴心伯 吴寄南 胡令远 贺 平 徐 平 徐静波
高 兰 高 洪 韩东育 蔡建国 樊勇明

弁 言

以冷战结束为分际，世界政治、经济之理念与格局均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塞缪尔·亨廷顿指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全球化、国际化浪潮的风起云涌及其逆流，新兴国家群体的快速发展，美国、欧洲、俄罗斯等进入多事之秋，实力相对走低，加之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等等，一系列新要素催生了新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版图。在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背后，作为推手的原动力究竟为何？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印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目下恐怕尚难给出答案。

在以断言“冷战”结束标志历史终结而暴得大名的弗朗西斯·福山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反观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实践，历史并未沿着福山所指方向顺利前行，其结论或正在被终结。所以，近年福山也不得不由未终结的历史引申出他对未来的预测。其指出：全球政治未来的重要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谁的模式会奏效？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中国的预期，那么从印尼到波兰，整个欧亚大陆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对此，世人足可拭目以待。

弹指间冷战结束已近30年，旧秩序与新常态，现实与历史的交错与蝉蜕，特别是近年，世界的各种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乃至瞠目结舌。由历史的巨

眼以观之，这或许是一种征兆——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冷战结束后，一方面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投射到国家间乃至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上。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权力观念的变化与权力转移也会成为伴生物。而具有古老文明并焕发出新的生机的中国的崛起，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与世推移的最大变量。百年变局的中国梦，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化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中国曾经为人类与世界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那既不是历史的绝唱也非余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造福人类，两者既互为表里，更并行不悖。

在战争与和平、全球治理等关乎人类命运与前途的重大历史与现实课题方面，当世界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中国时，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与哲学命题，并辅之以“一带一路”作为践行平台，获得世界积极回应。其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不言而喻是摒弃冷战思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理念与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一个历史性过程。其中，中国的一代学人，无疑对此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以日本和中日关系为术业的专门研究机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将以日本为案例，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建设、实践路径等。此即出版本套丛书之初心。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逆转，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面对这一历史性重大变局，需要两国发挥高度政治智慧。如何使中日关系平稳度过焦虑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成新的平衡，从而行稳致远，这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与利益，同时对于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均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学界虽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的日本及中日关系研究成果甚丰，但对冷战后近三十余年来的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趋势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套丛书拟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诸方

面，对冷战后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做一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本套丛书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的专著为主体，以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心的博士后和培养的博士生之专著为辅构成系列。此外，对本中心具有特殊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论文集，也适当择取收录。

本套丛书延聘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为顾问和编委，惠予指导与监督。

2020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将迎来创建30周年，本套丛书也是向本中心发展历史上这一重要节点的献礼之作。

近30年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成长，离不开中日两国众多相关机构与友人的鼎力支持与指导，我们期待能以高水平高质量的系列研究成果，来副大家多年来给予的厚望与厚爱！

未来的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继续造福世界，更要在思想和理念上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

2018年6月吉日于复旦燕园

鸣谢：

-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研究专项：“四种海权发展模式互动中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海洋政策及其中国对策研究”
- 2017 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近代以来日本海洋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对中日海权博弈结构的影响”
- 2017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菲律宾在中国黄岩岛水域所谓传统捕鱼权的研究”

致谢：

-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资助、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
-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目 录

绪 论	001
一、美日海权同盟的形成、发展与基本特征	001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综述	007
三、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	022
四、需要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	024
第一章 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026
第一节 海上安全理论的历史发展	026
一、合作与冲突理论：对海上安全理论的阐释与运用	027
二、海权论与传统海洋战略	029
三、中国海权理论的历史传承与创新	040
第二节 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的现状与发展	043
一、美国主导的传统海洋安全格局的维持与发展	044
二、亚太各国加紧海洋立法、海洋建设	048
第三节 海上安全环境发生严峻变化的特征及其原因	049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缺陷	049
二、《旧金山和约》的无效性与非法性	063
三、海洋发展与“中国威胁论”	067
第四节 亚太地区的海洋资源与权益争端	087
一、海洋资源对经济发展日益重要	087
二、亚太地区海上通道安全现状	092
三、海洋领土争端与东亚区域安全治理的模式	096

第二章 美日海权同盟战略的发展沿革	100
第一节 美国海洋战略的特征	100
一、美国海权理论的历史发展特征	100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亚海上安全的影响	105
第二节 日本海洋战略的特征	118
一、日本的海权思想与海洋战略	119
二、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122
三、当代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形态和功能	125
四、日本新安保法与“灰色地带事态”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129
五、日本海洋战略与东亚安全	139
六、国际危机管理与日本海洋战略的延伸	141
第三节 美日海权同盟战略的构想、路径、政策思路	143
一、理论分析：从美日同盟理论到美日海权同盟理论的建构、发展	144
二、“美日海权同盟”构想与发展	150
三、“美日海权同盟”实施特征	152
四、美日海权同盟强化的原因	154
五、美日海权同盟的制约因素	157
第三章 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160
第一节 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趋势：双边走向多边	161
第二节 美日海权同盟与亚太海洋合作	163
一、亚太地区海洋安全机制的缺失	164
二、亚太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与美日的作用、地位	167
第三节 前景展望：“一带一路”与美日海权同盟	175
结 语	181
参考文献	185
后 记	197

绪 论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1994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世界海洋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各国都在大幅度地调整为实施海洋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海洋政策。

21 世纪以来，美日同盟逐步表现为“构建美日主导下的国际海洋新秩序”，即建立美日海权同盟，旨在建立一个由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众多相关国家为依托的共同监管全球海洋的新秩序。美日海权同盟对于美日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美日同盟从传统的东亚地区军事同盟转为全球性同盟关系，在美国因素主导下，美国构建、巩固亚太地区海洋霸权。另一方面，日本参加美国所倡导的全球性海洋伙伴（GMP）关系，通过国家海洋战略核心的美日海权同盟，作为更加对等的伙伴国介入全球海洋活动，使得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呈现出地区性与全球性的双重特征。

一、美日海权同盟的形成、发展与基本特征

美日海权同盟着眼于构建未来的国际海洋秩序，美日希望扩大在海洋领域的合作范围来推行其国家海洋战略。2008 年 3 月、7 月和 2009 年 4 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OPRF）先后与美国新安全中心（CNAS）、企业研究所（AEI）及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等智库举办了三届“美日海权同盟对话”^①会议，至此正式启动了美日海权同盟的进程。

美日海权同盟的基本特征是，美日在情报、侦查和探测方面联手合作，彰显强大的海军力量。

2009 年 9 月，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围绕日本海上自卫队停止印度

^① 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海洋の安定と繁榮のための日米同盟シーパワー」、2009 年 4 月 17 日、http://www.sof.or.jp/jp/report/pdf/200904_seapower.pdf。

洋供油活动，以及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等，美日关系出现动摇。2011年“3·11”大地震后，美军迅速派遣2万名士兵和22艘舰船，以及140架飞机赴日开展救援活动，加强了美日“伙伴作战”的存在意义。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①，美军一直以来保卫日本的海岸线，美日“伙伴作战”，形成了日本强大的防卫抑止力。日本则认为，美日“伙伴作战”，以美日海洋国家同盟的方式处理地区大规模自然灾害，不仅可以加强美日关系，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应广泛运用于国际社会。

2015年日本推行新安保法案以来，美日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军事合作。根据2015年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日本的同盟地位不断上升，自主防卫意识日益强化，日本更加谋求主动作战活动，扩大主动作战范围、提升主动攻击力量。美日安全合作的领域则从传统的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反潜作战、反导作战、后勤支援等到太空网空合作，再到装备技术与情报合作，特别是加强了海上军事合作。例如，日本前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官香田洋二提议^②，建立日美海上战力新型互补态势，改变冷战时期美军攻势作战与日本自卫队防守作战的功能划分，由日本海上自卫队担当西北太平洋的潜水艇作战，美国海军军力则投放到其他海域。日本防卫省计划组建“日美共同部”，以提高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这是美日军事一体化的最新构想，该机构的成立将成为美日军事一体化的一个标志性进展，也将为美日联手干预亚太安全事务和日本放手发展防卫力量大开方便之门。

美国加强了在东亚事务中的介入与接触。随着美国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推进，特别是，在东亚海洋事务方面，美国正在打破双边接触谈判的模式，以三边主义或者多边的框架进行参与，客观上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加强与其亚洲传统盟国的关系，包括日

① 秋元一峰：「アメリカ軍による震災救助『トモダチ作戦』～日米海洋国家同盟の証が残したもの～海からの災害救助」，海洋政策研究財団ニューズレター 第266号。http://www.sof.or.jp/jp/news/251-300/266_1.php。

② 香田洋二：21世紀における日米海洋同盟の新たな側面——米海軍のアキレス腱／対潜水艦戦能力／日米の相互補完態勢、海洋政策研究財団ニューズレター 第208号。http://www.sof.or.jp/jp/news/201-250/208_2.php。

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同时谋求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在这些国家中，日本是和中国在东海有领土争端，菲律宾和越南同中国在南海有领土争端。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政策是，坚持主权、不随意改变现状。但是，南海现在是亚太地区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区之一，而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影响南海局势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大致经历了“持中立立场”、“关注度加深”和“实际上的选边站”三个阶段，其政策取向逐渐由“观察”调整为“干预”。^①美国希望南海问题多边化，美国以“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军事帮助菲律宾、越南等。

例如，在2010年4月召开的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挑起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ARF会议上再次提出南海问题。2012年4月份的美菲军演由原有的双边模式转变为多边模式，日本、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盟国家均派人参与了演习，美国希望加强其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并趋于整合东亚地区美国的军事实力。2013年5月，美国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云（Joseph Yun）阐述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奉行的五项原则^②：一是美国对相互竞争的领土主权要求不持立场；二是这些领土要求必须建立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必须与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一致；三是对南海海域和领空的主权要求必须来自对岛礁的主权要求，必须证明这些要求是合法的；四是美国在如何处理争端和解决争端方面有巨大的利益，包括在全球公共领域里应有航行自由，美国在南海合法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活动不应受领土主权归属的限制两个方面；五是应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美国认为，可以是外交谈判，也可以是通过第三方的国际仲裁，如国际海洋法法庭。不应试图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各方应努力建立南海行为准则。美国认为，海上航行自由对于执行其全球战略至关重要，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中国澄

① 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

②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Keynote Address by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seph Yun at the Thi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http://www.nexis.com>.

清九段线的依据，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

2014年2月5日，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众议院关于东亚海洋争端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使用了更具有指向性、措辞更严厉的词语，指责中国在南海基于九段线的领土要求缺乏明确性^①。201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2015年度《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提到了南海问题。2015年10月27日，美方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和坚决反对，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安全，危及我渔民正常生产作业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和“台州”号巡逻舰依法予以警告。美国派遣作战舰艇进入中国南海岛礁近岸水域，采取军事手段，借口所谓航行自由，其实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无害通过”原则，其实质是对中国施压。美国的南海政策日趋强硬和在南海问题上介入程度的加深，不仅影响南海局势，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在黄海问题上，2010年发生“天安号事件”，使得东北亚安全问题从朝鲜半岛陆上影响到海上问题。中国认为，“天安号事件”是原因不明的突发事件，应保持朝鲜、东北亚的稳定。美国则借口“天安号事件”关系到美国航母是否进入黄海的问题，之后引发连续的黄海演习，美韩同盟得到加强。据不完全统计，美韩联合司令部主导的联合演习每年有百余次之多。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航母每年访问韩国两至三次，每次都举行相应的联合演习。2015年8月，美韩举行了“2015综合火力剿敌演习”等演习活动。

在东海问题上，美国从消极观望逐步转向积极介入。中日在东海的海洋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东海油气田开发与钓鱼岛领土争端。在东海油气田开发工作中，美国基本上保持了观望的中立态度，观察中日两国的双边接触与谈判进展。但是，2010年9月7日，中国15名船员在我国钓鱼岛海域被

^① Assistant Secretary Russel'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on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http://www.cfr.org/territorial-disputes/assistant-secretary-russels-congressional-testimony-maritime-disputes-east-asia/p32343/>.

日方非法抓扣，发生钓鱼岛中日撞船事件以来，美国打破了战后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贯的沉默立场，宣称美日安保范围适用于钓鱼岛。2011年6月21日，美日时隔4年举行了由外长和防长共同出席的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发表了联合文件^①。2014年5月奥巴马访日，两国签署首脑共同声明，提出要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结合在一起，共同打造亚太地区秩序^②。2015年9月，日本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新安保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立即表示，“欢迎日本在地区及国际安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施大伟也公开表示，美日合作的范围“从平时的海洋监视扩展至广泛范围的突发事态应对”，美国对与日本扩大海上合作表示出期待。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世界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必须依靠海洋。从意大利开始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美国，全部是海洋大国。因此，中国的崛起也一定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崛起，而绝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崛起。2012年以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正是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情需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2012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呈现两大特征^③：一是中美竞争加速周边国家的分化，二是海上争端推动中国海洋政策调整。中国与美、日等国之间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开发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但同时也存在海洋领土争端零和博弈危险的海洋安全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亚太海洋秩序的改变，以及传统海权大国美日等与正在发展的新兴海洋强国中国之间的力量博弈。

2013年以来，中国面临更多挑战：一是美日政府换届后进入政策磨合

①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より深化し、拡大する日米同盟に向けて：50年間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基盤の上に」、PDF版，2011年6月21日。日本外务省网站，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pdfs/joint1106_01.pdf。

② “U.S.-Japan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and Beyond”，April 25, 2014，见日本外务省网站，www.mofa.go.jp/mofaj/。

③ 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3）——海上争端的焦点与根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期，极大地影响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二是中国进行实质性的海洋强国战略的布局，来自海上争端的挑战有加剧的趋势。2013年，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①，指出，我国的海洋安全形势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海洋安全是我国目前国家安全的重点方向。未来20年，中国大洋工作将立足资源，超越资源，以增加国家战略资源储备、推动深海科技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确立中国在大洋事务中的强国地位为战略目标，实现立足太平洋、开拓印度洋、挺进大西洋的大洋战略布局。通过大洋科学考察等工作，推进中国海洋事业发展、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提高参与国际海洋事务能力。

2015年，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②，围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和“一带一路”倡议要求，指出以下观点。即，合作与发展是当今海洋事务的主流；中国不断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海上周边环境，致力于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互利共赢，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中国继续完善涉海政策，保障建设海洋强国目标的实现；中国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和海上执法；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态势总体平稳；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有所提升，但利用质量、效率、效益较低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全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总体维持在较好水平，但部分海湾污染仍然严重，为尽快改变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现状，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体系；中国海洋灾害正处于多发、高发期；全球海洋总体形势依然保持基本稳定，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所增加，海洋安全问题长期性、复杂性、多变性特征更加明显；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沿海各国共谋发展、共同繁荣提供了新的重大契机。《报告》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与周边国家共建的“人海和谐、和平发展、安全便

①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网页。<http://www.cima.gov.cn/>。

②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网页。<http://www.cima.gov.cn/>。